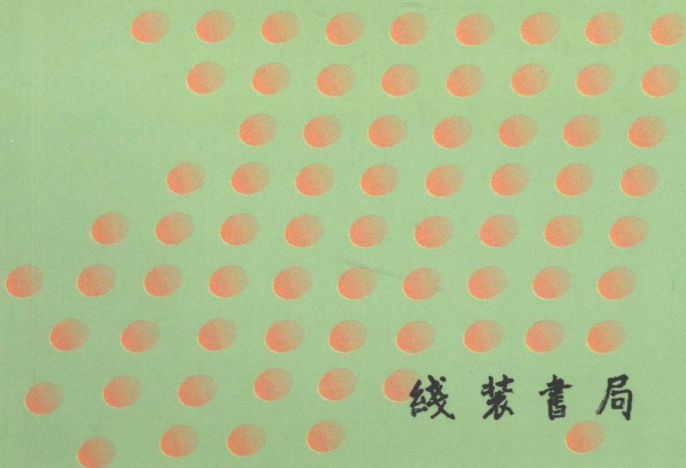


社科文献论丛第14辑 / 姬汝茂主编

京派文人研究

柴建才◎著

JINGPAIWENRENYANJIU



线装书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14辑/姬汝茂主编

京派文人研究

柴建才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派文人研究 / 柴建才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9.6
(社科文献论丛第14辑/姬汝茂主编)
ISBN 978-7-80106-968-9

I. 京… II. 柴… III. 作家—人物研究—北京市—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334 号

京派文人研究

著 者:柴建才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22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281.00 元(全 10 册)

即使是一枚青色的果子，
它也凝聚培育者的心血和期盼！

——题记

CONTENTS 目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京派文人与时代革命主潮的碰撞	(5)
第一节 “京派”的形成及其文艺观	(5)
一 京 派	(5)
二 “京派”代表文人的文艺观	(7)
第二节 京派文人与左翼文坛的论战	(20)
一 梁实秋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21)
二 沈从文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31)
(一)前期:沈从文以文学进行民族品德的 发现与重造	(32)
(二)后期:沈从文企图以文学影响政治	(46)
三 朱光潜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63)
四 萧乾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80)

第二章 京派文人在时代转型中的艰难抉择	(90)
第一节 左翼文化界对“京派”文人的批判	(90)
一 左翼文化界开展文艺大批判的背景	(91)
二 左翼文化界针对“京派”文人的文艺大批判	(95)
三 文艺大批判的效应	(100)
第二节 京派文人在时代转型中的艰难抉择	(104)
一 萧乾:在大十字路口的抉择	(105)
(一) “去”与“留”的抉择	(105)
(二) 积极趋从	(115)
(三) 沦为右派	(120)
二 朱光潜:积极适应新的时代	(126)
(一) 选择留在大陆	(126)
(二) 从“自我检讨”开始	(129)
(三) 思想改造运动	(133)
(四) 学术思想批判	(139)
三 沈从文:时代巨变大潮中的“游离分子”	(149)
(一) 文学梦想的陨落	(149)
(二) 时代巨变大潮中的一个“游离分子”	(155)
(三) 沉默归队	(165)

第三章 京派文人在疏离与趋从之间徘徊	(177)
第一节 沈从文:簪者不忘履	(177)
一 用笔为新时代服务的心愿	(178)
二 “创作之梦”的沉落	(188)
第二节 师陀:“趋从”创作的苦涩	(198)
一 师陀早期创作兼具“左翼”与 “京派”两种因素	(199)
(一)师陀早期创作中的“左翼”因素	(199)
(二)师陀早期创作中的“京派”因素	(202)
二 建国初:讴歌新时代	(208)
三 反右后:转向历史题材创作	(214)
四 新时期:旧作修改	(222)
第三节 汪曾祺:“间断性”创作探因	(231)
一 40年代:“京派”创作及其转向	(231)
二 50年代:创作“沉寂”	(236)
三 文革年代:“样板戏”走红	(240)
四 新时期:创作“晚成”	(247)
第四章 当代学界视野中的京派文人	(256)
参考书目	(264)
后 记	(268)

绪 论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京派文人及其文学”作为“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以来，在迄今近 30 年的现当代文学学界视域中，“京派文人及其文学”一直是研究者热衷言说的话题。“京派”问题受到学界如此眷顾，固然与“京派文人”取得璀璨夺目的文学成就有关，与“京派文学”代表着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流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有关；然而，“京派文人”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精神理想的不懈追求和执著坚守，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际也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诱因。不仅如此，对“京派”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主宰 20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一种反拨。

现在，我将“京派文人的当代命运观照”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因素。我从喜爱“京派”文学作品开始，进而关注“京派”文人的个人命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精神心理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 20 世纪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革命征程中，“京派”这个自由主义文人群体与时代革命主潮的屡屡碰撞，及其他在新旧时代转型之际，大多被拒于“文学主潮”之外。我常想，如果“京派”文人在新时代能够保有他们手中的一支笔，能够在精神独立自由的基点上继续抒写他们的文学梦想，那么 20 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园地又该有怎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壮景，……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我观照“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的人生命运，发现他们几乎可以说都是悲剧性的。他们在时代转型之际，在巨大的革命

政治洪流的裹胁下，被动地放弃自己原初的人生信仰和文学观念，通过艰难的思想改造，有限地融入当代新的社会秩序中，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尽管如此，他们仍难免去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屡遭冲击的厄运。在漫长的人生困境中，他们是“控制使用”的对象，也是反复“割尾巴”的典型，他们的理想，才华在黯淡的人生岁月中渐渐枯萎，消逝。……可以说，正是“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的悲剧性命运，牵动着我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来梳理、探寻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因素。

剖析“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的悲剧性命运，政治外力的作用无疑是首选的决定性因素。“京派”文人疏离政治追求自由创作的文艺观，他们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然与视革命政治为文学根本特征的左翼文艺发生碰撞；也决定了他们在建国后50~70年代的那个激进的政治化时代必然地趋于边缘化；……然而，把“京派”文人的悲剧命运仅仅归因于政治外力的作用也不尽然；在对“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的悲剧命运的深入探索中，我发现“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的人生困境，也有相当一部分因素应该归因于自身的自觉主动地或被动地人生选择，如沈从文的转业；归因于“京派”文人对当代主流话语模式的自觉疏离或自觉服膺，这种情形从“京派”文人在新时代大都徘徊于疏离与趋从的矛盾境地中可以看出。此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京派”文人与左翼文人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多次论战中所积下的深怨纠葛，以及在个别场合的私人意气之争等因素均可导致“京派”文人在左翼文人执掌文艺权柄的新时代备尝艰辛。正如日本学者丸山升在《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一文中所说：“当我们在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现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

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①当然，上述诸种因素是“京派”文人在当代中国 50~70 年代罹难的共性因素，而具体到每个作家由于个性化因素的介入，而使问题必然变得复杂起来。本文的目的是在探寻文艺创作过程中影响“京派”文人精神心理的共性因素，导致“京派”文人悲剧人生的共性因素，以期给后来者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

在具体地梳理、探寻“京派”文人在当代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因素时，我采用历时考察和作家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以前者为经，后者为纬，来编织“京派”文人在 20 世纪的人生图景。选择作家个案的标准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观和卓著的创作成就，而且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活动对现当代文坛有重要影响，其文学活动和悲剧性命运具有反思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效应。基于此，本书根据内容特点拟分为以下四个章节：

第一章：“京派”文人与时代革命主潮的碰撞。介绍了“京派”的形成及其文艺观，这是“京派”文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与左翼文艺发生必然性碰撞的内在根因。这种碰撞既有“京派”文人追求独立自由创作，追求文艺臻于完美境地的合理性因素，也有其脱离时代疏离革命的局限，并且由此埋下了与左翼文人“不和”的种子，从而导致了他们在新时代的苦涩人生。

第二章：“京派”文人在时代转型中的艰难抉择。梳理了左翼文化界对“京派”文人的政治批判。“京派”文人在自由主义文艺空间日渐消失的严峻现实面前进行了艰难的人生抉择。由于“京派”文人中的每个自由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面前具体的思想

① （日本）丸山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文洁若译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1990 年。收入《微笑着离去——忆萧乾》，文洁若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年。

状况和精神心理的不同，因而这种人生选择便呈现了复杂多样的形态，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便各具特色。但无论怎样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渴望被新秩序接纳的心理诉求，这是他们走进新时代共同的精神心理基础。

第三章：“京派”文人在疏离与趋从之间徘徊。揭示了“京派”文人在 50~70 年代日益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所呈现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严峻的政治现实需要他们向新秩序趋从，否则便过不了关，得不到组织的认可；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彻底放弃自己信奉的文艺观念，于是在艰难的人生困境中便呈现出一种既疏离又趋从的复杂精神面貌，以及由此而变生的复杂创作风貌。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断”近 30 年后，在年近花甲之际，获得了创作“晚成”。而“京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师陀却仍在不停地修改旧作，以适应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汪曾祺的“疏离”和师陀的“趋从”都从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政治对“京派”文人的深重影响。

第四章：当代学界视野中的京派文人。本章梳理了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京派”文人及其文学在受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新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曲折历史；指出了在新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京派”文人及其文学浮出了历史地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的却是，学界出现一种为历史复杂的自由主义文人、汉奸文人及其文学“溢美”的奇怪现象。本章以周作人为个案，阐述了怎样正确地评价复杂历史人物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章 京派文人与时代革命主潮的碰撞

第一节 “京派”的形成及其文艺观

一 京 派

“京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内涵：一是指戏剧中的“京派”；另一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

戏剧中的“京派”历史较长，它原指“京剧”中的一个流派，它是相对于“京剧”中的“海派”一脉而成立的。“京剧”的历史起源于18世纪末乾隆年间的宫廷戏剧活动。1751年，乾隆皇帝为母亲60寿辰祝寿；其后，乾隆本人80寿辰之际又大办庆典，大量罗致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进宫庆贺。到清同治年间，新兴商埠上海的丹桂茶园邀请“京二簧”的艺人南来演出；尤其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一批演“伺候戏”的名角脱离宫廷，到黄浦江畔扎根。从此“京剧”中便有了“京派”与“海派”之分，这是戏剧中的“京派”来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历史较短。它一般指新文学中心在20年代末南移上海后，在30年代仍然活动于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群。这个流派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流派不同，它并没有正式宣告成立，也没有一定的宣言和章程，而是由一些文艺观念和艺术趣味相同或相近的

文人自发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人群体。至于“京派”的名号也是后来在1933~1934年间喧嚣文坛的“京”“海”之争中才追加的。从“京派”的文人队伍组成来看，其成员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20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于讲性灵、趣味的作家，这以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等为代表。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如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梁宗岱等。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的其他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如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师陀、李长之等。^① 上述这些成员中，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李广田等；诗歌方面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此三人因共同出版《汉园集》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和后起的林庚等。戏剧方面的力量较弱，主要代表作家有李健吾和林徽因等。小说方面力量雄厚，主要代表作家有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和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这其中，沈从文是“京派”的领袖，其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也是“京派”最后一个文学传人。“京派”理论方面的代表主要有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李长之等。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

“京派”的主要阵地是以下四种刊物：《骆驼草》创刊于1931年，由废名、冯至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沈从文于1933年9月开始接编；《水星》创刊于1933年10月，由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编辑；《文学杂志》创刊于1937年5月，由朱光潜编辑。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上述“京派”文人的思想和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30年代前半期，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倾向和主张，在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因而形成了若干重要鲜明的艺术特色。如“京派”小说就具有如下的风貌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张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融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使用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形成平和、淡远、隽永的总体风格。

“京派”辉煌的时期是30年代前半期。抗战爆发后，“京派”便风流云散。当时，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寇手中，“京派”文人的安详、隐逸的心境不复存在。此时，萧乾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早已迁沪；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也毁于炮火之中；周作人留在北平，堕落为汉奸；废名向往佛学，回到故乡湖北黄梅县教中小学；朱光潜、沈从文到了四川、云南，分别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著名学者杨义认为：“京派的散落自然是因战争的缘故，不过，这班文人安详无为，疏离时代潮流的心理状态，使流派内部早就存在着艺术追求的松散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艺术层面。”^①这也是“京派”散落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为“京派”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抗战胜利后，“京派”主要文人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又云居北平，不过此时的“京派”已经处于时代的风雨飘摇之中。

二 “京派”代表文人的文艺观

通过对“京派”历史的梳理可知，“京派”不是一个纯正意

^①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义上的文学流派，也没有正式组派的统一宣言和章程，因此，从表面上看，“京派”没有一个统一的文艺观。“京派”的文艺观主要体现在“京派”的几个著名理论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人的文艺思想中。然而，从实质上看，“京派”文艺观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其具体表现是：疏离政治，追求独立自由的创作和纯正的艺术趣味。

1. 周作人：文学是“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是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其主要功绩在于新文学理论的建设上，其主张文学是“自己的园地”的文艺观对“京派”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周作人的文艺观是“京派”文艺观的源头，也是“京派”文艺观的精神内核。以此，周作人被尊称为“京派”的鼻祖、第一代盟主，“京派”公认的精神领袖。

五四前后，周作人的文艺观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轨迹，即从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发展到五四后主张文学是“自己的园地”。这种变化表明了周作人对文学创作中的“功利性”的疏离，和对独立、自由、纯正的艺术趣味创作的追求。我们知道，1918年底，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明确提出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文学被作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助长人性发展，提高人的精神生活。^①由于此前的中国文学是“非人的文学”，没有关注人生问题和底层人的生活。因此，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1919年初，周作人承继“人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104～10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的文学”的观念，又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强调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生活提高”的目的。^①分析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这两个文学主张，可以发现它们都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即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但同时它们又主张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又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这说明，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从一开始便为以后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作了准备。

五四刚过，周作人即开始反省“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这两个口号中所包含的功利主义。1920年1月，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讲演中，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就认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主张，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②1921年1月，周作人为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由于他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此时已心存疑惑，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③1923年，周作人的文学观发生明显转折。这年9月，周作人的文学评论集《自己的园地》结集出版，它标志着周作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周以“自己的园地”作喻，主张依照个性，表现自己情思的文学。为此，他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

① 周作人：《平民文学》载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5号。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116页。

②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③ 周作人：《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的艺术派”。^①“自己的园地”实际上强调了作家独特的人格品性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与体现。它意味着在创作中每个作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这样，1923年之后，周作人便与占文坛主导地位的功利性文学思潮拉开了距离，也与时代拉开了距离。

“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观的核心。它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文学的创作个性和“不为而为”的创作态度。在文学批评上，它主张“宽容原则”。1923年，周作人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明确地说：“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②周作人的“宽容原则”，其实质就是尊重文学的创作规律。尊重创作个性的自由发抒，承认文学创造性思维的求异性、活跃性，并着眼于文学精神现象的无限开发性。不能定于一尊，不能以“统一”抹杀个性，不能以“规范”取消自由，这是文学区别于宗教、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因此，周作人极力反对“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③他认为“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查，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批评家的工作意义仅在于为读者提供一种鉴赏或分析，而不是“法理的判决”；任何批评家都没有权利按某个“批评上的大道理”去统一文坛，也不应当“特别制造一个樊篱”，迫令“个个作者

①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发表于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② 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

③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第31页。